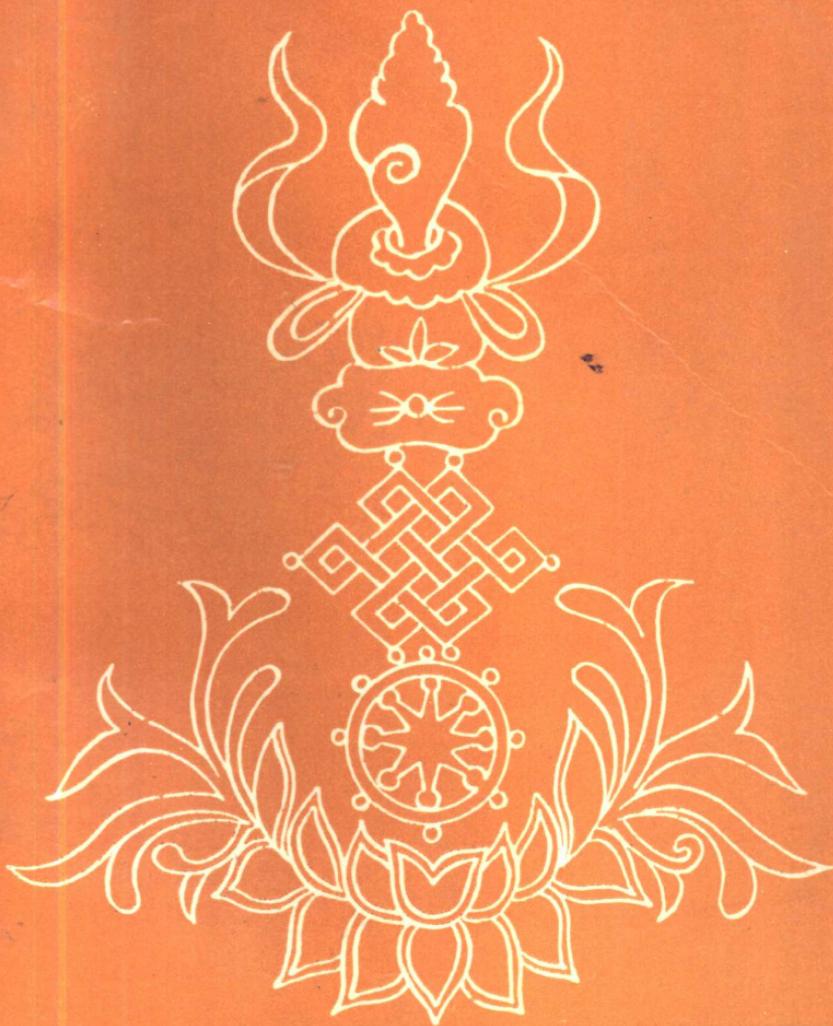


藏学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藏 学 研 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藏 学 研 究

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三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2印张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统一书号 ISBN7-80504-154-7/G·16

定价：4.45元

目 录

历 史

清朝确认仓央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之历史

经过 李秉铨 (1)

六世班禅大师东来旅途记要 多杰 (12)

章嘉·若必多吉年谱 陈庆英 (62)

清代驻藏大臣职权之我见 国庆 (89)

八世达赖喇嘛姜白加措 杨清芬 (102)

1907年英俄《西藏协定》的修订 王远大 (141)

西藏阿沛贵族庄园的户口册 陈金钟 (186)

民国初年拉萨动乱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

关系 喜饶尼玛 (206)

岳钟琪与藏区 一思 (222)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 (意)伯戴克著

喜饶尼玛、金红梅译注 (228)

宗 教

川西本教调查报告 郭卫平、国庆 (239)

佛教在藏区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缘由 罗桑开珠 (253)

藏传佛教学经僧考取学位简析 孙雨志、刘洪记 (267)

文 化

陈寅恪先生对我国藏学研究的贡献 王尧 (277)

藏族文化与现代化 丹珠昂奔 (284)

- 一部珍贵的藏文史籍——《萨迦世系史》……周润年(326)
略谈藏族的姓氏………郭须·扎巴军乃(334)
试析《格萨尔王传》中的谚语………泽仁德西(338)
西藏民间体育运动浅探………李双剑(346)
西藏的各种工艺………东嘎·洛桑赤列文(351)
- 国 庆译
- 甘南藏族习俗浅议………格桑达吉(358)

附 录

- 《藏学研究文集》1—5集总目录………孙雨志辑(375)

清朝确认仓央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之历史经过

李秉铨

现在人们都知道仓央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但，仓央加措被清朝中央政权确认为六世达赖喇嘛，曾几经周折，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一个世纪，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阴历六月上旬，六世班禅大师到承德同乾隆皇帝见面的前一个月，才最终被确认下来的这件事就鲜为人知了。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第巴桑杰加措一面对外掩匿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事；一面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按照宁玛派两喇嘛示言，认定了出生于门达旺拉沃玉松地方的仓央加措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将此灵童迎至日喀则经五世班禅大师洛桑益西落发剃度出家，并密藏于羊卓雍措湖畔的南卡子宗一寺中不使人知晓，对外仍以五世达赖喇嘛名义发号施令达十六年之久，直至公元1696年康熙御驾亲征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之后，此秘密始暴露，受到康熙皇帝的严斥，第巴桑杰加措派人专程到北京奏报朝廷，说明“五世达赖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达赖喇嘛已十五岁”。同时，要求康熙皇帝继续为之保密。康熙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于第二年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派理藩院主事保住前往西藏看明转世之小达赖喇嘛”。接着，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将灵童仓央加措迎入拉萨布达拉宫中坐床。这时，清朝虽未正式发表谕

旨表态，但也是经第巴桑杰加措奏明皇帝，皇帝派保住察看之后允其坐席的，实际上是承认了仓央加措为达赖喇嘛的。

此后不久，第巴桑杰加措与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的矛盾暴发，唯黄教独尊的拉藏汗在黄教派三大寺的支持下赢得了胜利，尊崇红教的第巴桑杰加措只好下台，同意离开拉萨隐居于曲水地方，西藏地方政府的事务由第巴桑杰加措的儿子代掌。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拉藏汗与第巴桑杰加措的矛盾进一步恶化，究其原因，据《清实录》记载：“第巴曾毒拉藏，因其未死，后复逐之，是以拉藏蓄恨兴兵执第巴而杀之”。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这场矛盾的风波也波及到了年仅二十四岁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加措。拉藏汗启奏朝廷历数第巴桑杰加措之过，其中有一条就是“立假达赖喇嘛”仓央加措。康熙闻报，遂爱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往西藏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同时令拘拿假达赖喇嘛仓央加措赴京，这在《清实录》中是有明文记载的。刚刚掌管西藏政权的拉藏汗恐西藏局势再乱，未立即放行，等到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他的权力稳定了，才主动“起解假达赖喇嘛进京”。当仓央加措被拘送到青海湖时，理藩院奏报康熙说：“驻扎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报称，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后世许多书中根据《清实录》康熙朝的这一条记载说六世达赖喇嘛死于青海湖。那么，他是否真的突然死在青海湖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在藏文《六世达赖喇嘛秘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说“当二钦差大臣及圣喇嘛（指仓央加措）一行到达青海湖时，突然接到大皇帝上谕，言责二钦差办事不当，说他们将圣喇嘛送来北京实属糊涂之举。于是二钦差告知圣喇嘛说‘现在你不能到北京去了’。圣喇嘛答说，‘我一定要到北京越过皇宫的金门槛，面见大皇帝圣容，奏明情由，西藏是坚决不回去了’。最后，双方商谈的结果是对外宣布圣喇嘛暴亡，实际上纵其隐姓埋名云游天下了。”这段记述表明，当二钦差大臣按着康熙原先的旨意将仓央加措解送北京的路上，康熙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出尔反尔将责任推给了

钦差大臣。仓央加措并没有死，是二钦差宣布其暴亡的。那么，他是否又如藏文《六世达赖喇嘛秘传》中所说的“此后便隐姓埋名云遊天下呢”？也不是。在藏文《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晋京途中路经五台山时，曾拜谒过六世达赖喇嘛居住和圆寂的遗址“观音洞”。看来，仓央加措被宣布暴亡之后，康熙将其秘密囚禁在五台山，直至他去世。至于说仓央加措隐姓埋名云遊天下最后定居死于宁夏阿拉善旗等等，是不大可能。原因很简单，当时康熙派人前往西藏捉拿仓央加措进京的考虑，在《清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康熙“谕大学士等：前遣护军统领席柱等往擒假达赖喇嘛及第巴妻子时，诸皇子及诸大臣俱言一假达赖喇嘛擒之何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很清楚，康熙担心的就是仓央加措落入蒙古人之手，所以清朝是根本不会允许仓央加措云遊天下的，更不会允许他自由活动并定居在宁夏蒙古阿拉善旗的。所以，宣布其暴亡后，秘密囚禁于五台山的可能性极大。

拉藏汗将仓央加措送出西藏以后，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立益西加措（蒙语称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但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众台吉对此持极大疑议，于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康熙皇帝派内阁学士拉都浑率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看验益西加措。拉都浑从西藏回奏朝廷说，“臣遵旨会同青海众台吉之使前往西藏。据拉藏汗称‘前假达赖喇嘛解京时，曾奉谕旨令寻真达赖喇嘛，今访闻得波克塔胡必尔汗实系真达赖喇嘛，亦不能信，又问班禅胡土克图，据云，波克塔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我始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清朝接到此奏后，做出两个决定：一是今波克塔胡必尔汗年幼，再阅数年始议给封；一是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汗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汗独理，

于是康熙派遣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是清朝派官员到西藏直接参与管理西藏事务的开始，后来又将此发展为驻藏大臣。过了不久，拉藏汗及班禅胡图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疏请颁赐波克塔胡必尔汗以达赖喇嘛之封号。康熙皇帝准请，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颁布旨曰：“查波克塔胡必尔汗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印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对于拉藏汗新立的这个达赖喇嘛，西藏方面虽没有发生大的矛盾，但是青海蒙古和硕特众台吉却继续表示反对，整个青藏和硕特内部之争不仅没有平息下来反而日趋尖锐化。康熙深感和硕特内部因确立年幼的达赖喇嘛之争导致青藏不安，将会被准噶尔利用，于是决定把西藏、青海和硕特众台吉共同尊崇的五世班禅予以册封，树立起来，尽快平息和硕特内讧，集中对付准噶尔这个大的战略目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月，他直接指令理藩院曰：“班禅胡图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职责，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得尼。”（见《清实录》康熙朝。注意，此时的封号是“班禅额尔得尼”而非“班禅额尔德尼”，使用“班禅额尔德尼”封号是乾隆时期的事。）

就在康熙皇帝册封班禅大师，树立权威，想稳定住青藏和硕特不和的同一时期，青海右翼贝勒戴青和硕齐、察汉丹津等在康区理塘地方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灵童并迎至青海，上奏朝廷曰：

“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对此，康熙的态度是“以伊等俱系固实汗子孙，朕欲使共相和睦。若将此（理塘出生的）胡必尔汗留住青海，恐其兄弟内讧或起争端，特遣侍卫阿齐图等前往谕令将里塘之胡必尔汗送京亲看。又遣主事众佛保往班禅处问此胡必尔汗之真假”。问的结果，“班禅称：理塘之胡必尔汗是假”。于是，青海和硕特众台吉的代表戴青和硕齐等要求亲往西藏班禅处问其真假。察汗丹津等则要用

军队把理塘的灵童送往西藏。

综观上述这段历史，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之所以闹出三个六世达赖喇嘛来，纯属当时控制着西藏、青海的蒙古和硕特内部各首领争权的结果。这种内讧的发展，完全不出康熙所料，给地处新疆的准噶尔部造成了极好的可乘之机，即早就对西藏财富垂涎三尺的准噶尔，清楚看到进兵西藏灭孤兵无援的拉藏汗易如拉朽。公元1717年，准噶尔发兵六千余人经荒无人烟的藏北高寒地区直抵拉萨的北部地区当雄，不久即攻下拉萨，1918年1月拉藏汗阵亡于布达拉宫东面。城门失火又一次殃及鱼池，准噶尔首领把拉藏汗所立的益西加措囚禁在拉萨的药王山，整个西藏僧俗人众陷于准噶尔掠杀的苦难之中。自固实汗以来，和硕特控制了半个多世纪的西藏现在丧失了。于是，青海的和硕特部把驱逐准噶尔出西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朝大皇帝的身上。

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完全成熟了。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先是派署理将军总督额伦特、侍卫色楞率兵丁二千多人至黑河讨贼，但未能成功。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七年(1719年)十二月，特命其皇十四子允禩为抚远大将军，在太和殿跪受敕印，率众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青海，并且由陕甘川滇调兵进藏围剿准噶尔。经过一年之准备，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正月，命抚远大将军允禩率先锋移驻通天河，居中调度各路大军进兵西藏；同月，清朝颁金册金印封移居塔尔寺理塘出生的灵童格桑加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由清兵护送一起进藏安禅。格桑加措时年十三岁，后来，雍正时期，于雍正二年(1724年)再次颁金册、金印对格桑加措加封，但仍然是以六世达赖喇嘛册封的。这是由于康雍两朝时期，清朝处理西藏问题的方针是团结、稳定住青藏地区的蒙古和硕特部，集中防止准噶尔再度出新疆东犯。所以，在尊崇谁是六世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上，完全是顺从了蒙古和硕特众首领的意愿进行的。而当时，与蒙古和硕特部众首领意愿不尽相同的广大藏族人士则认为仓央加措是

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是七世达赖喇嘛。这里顺便说一下，据藏文《五世班禅大师传》记载，仓央加措、益西加措、格桑加措这三位达赖喇嘛都是由五世班禅大师落发剃度的，他们的名字也是五世班禅大师命名的，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再转世对待的，格桑加措是作为仓央加措的再转世对待的，即七世达赖喇嘛。但藏族人士的这一意愿被清朝皇帝所接受，那是到了乾隆二十年（1756年）清朝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以后的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圆寂。乾隆指定第穆呼土克图任“代理达赖喇嘛”。这是在西藏设立“代理达赖喇嘛”职位的开始。是年年底又派章嘉国师进藏协助驻藏大臣寻访达赖喇嘛新转世灵童。章嘉在藏住了一年多，这期间协同驻藏大臣、第穆活佛，并征求了六世班禅大师的意见，最后选定出生于后藏托结地方的一男孩为灵童。章嘉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返回北京上奏朝廷，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颁谕西藏任代理达赖喇嘛的第穆活佛，准予确认此灵童为达赖喇嘛格桑加措的转世灵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正月，六世班禅大师给灵童落发剃度并命名姜白加措。同年，乾隆谕旨西藏“今呼毕勒汗业已成长，会见各方人士亦不赧然，可着达赖喇嘛之呼毕勒汗于布达拉宫坐床”。此旨到达西藏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藏历七月初十，姜白加措在布达拉宫正式登上达赖喇嘛之坐。但是从此以后的十八年间，即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为六世班禅大师前来祝寿而在承德修建的《须弥福寿庙之碑记》未公布以前，乾隆皇帝一直未宣布姜白加措是几转世的达赖喇嘛，甚至，这位达赖喇嘛到了二十四岁，大大超过应该册封的年令时才予以册封的。这使后世的历史学家做出了种种推测，或曰：“姜白加措莽钝，不受乾隆重视”；或曰：“六世班禅大师与乾隆关系非常密切，乾隆拟把西藏的政教大权交给班禅，后来六世班禅突然病故于北京，乾隆才不得不册封了姜白加措”。（如意大利贝戴克教授持

此说）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乾隆迟迟不肯册封的根本原因。关于莽钝不受重视之说，在杨清芬所撰《八世达赖喇嘛姜白加措》一文中引用的历史文献已予以澄清；关于乾隆拟把西藏的政教大权交给六世班禅的说法也不是事实，因为六世班禅在承德和北京同乾隆朝夕相处的短短四个月中，乾隆曾两次主动征求六世班禅关于册封姜白加措的事，这在藏文《六世班禅大师传》中有详细记载，《清实录》中也有相应记载。所以这些都不是乾隆迟迟不册封姜白加措的实际原因，造成乾隆拖了二十多年才册封姜白加措的根本原因是，要册封就得表明姜白加措是七转世的达赖喇嘛，抑或是八转世的达赖喇嘛这个重要问题。如果继续按照康雍先皇祖制说格桑加措是六世达赖喇嘛，那么姜白加措就是七世达赖喇嘛，这将会使章嘉国师、六世班禅大师等这样一些深深尊崇他的藏族人士大失所望，但是，要改变康雍两朝列祖列宗的圣谕，对于这位事事尊效祖宗，处处注意皇朝威仪的皇帝来说，可以想象得到是多么困难，多么痛苦的事。这就是他一年一年拖下去的症结所在。

促使他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动力终于产生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章嘉国师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见《清实录》乾隆朝）。由六世班禅大师亲自到承德来给他祝寿，这对于好大事喜功的乾隆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大放光彩、举世瞩目的盛事。他非常高兴，提前两年前就开始了各种迎接班禅的周密准备工作，他不仅拨巨资在承德修建豪华的“须弥福寿庙”以资六世班禅大师安禅，而且在他御笔撰文的《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开始明确宣布了姜白加措是八转世达赖喇嘛，这就意味着说格桑加措是七世达赖喇嘛，仓央加措是六世达喇嘛了。完全满足了西藏广大人士几代人蕴藏于心里达七十年之久的夙愿。

从姜白加措被确定为达赖喇嘛格桑加措的转世灵童后经过了

十八年的时间，直至六世班禅大师到承德的前一个月，才突然宣布姜白加措为八转世达赖喇嘛，虽然不能认为这个决定是出于他一时激动所为，但是，六世班禅大师的晋京祝寿，无疑在促使他最后下决心宣布此事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历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从乾隆方面来看，为了避免修改祖宗的圣谕引起的突然震动，选择了于正式颁诏册封之前，先用庙记碑文的方式放点风，为日后正式颁诏册封宣布此事做了重要的铺平工作。另外，从时间上选择了六世班禅大师还未到承德前的一个月就宣布了此事，免得当面同班禅讨论关于册封姜白加措的封文时，班禅奏请提及此事更为主动，更显示出他对西藏人士心情的体察、早有远见卓识之明，使黄教派一代名教主六世班禅对他“文殊菩萨化身的大皇帝”更加心悦诚服。

六世班禅大师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与乾隆皇帝见面的。乾隆是在此一个月以前，即“乾隆四十五年岁在庚子夏六月上浣御笔”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宣布：“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一曰凯珠布格埒克巴勒藏，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此碑文现在仍在承德须弥福寿寺碑亭中）。宣布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即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禅才到达的承德。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即八月十四日祝贺完乾隆七十大寿的第二天，乾隆于避暑山庄卷阿胜境盛宴班禅大师及蒙古王公等，是夜乾隆对六世班禅大师说：“朕欲依先皇之例规，颁诏册封今达赖喇嘛，现与尔喇嘛相商后将颁之。”（见藏文《六世班禅大师传》及《清实录》乾隆朝）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即九月初三，乾隆从承德将册封姜白加措的册文稿寄给已到达北京的六世班禅大师征求其意见。十月乙卯，乾隆谕旨姜白加措曰：“班禅额尔德尼因朕七旬万寿祝嘏来京，经朕问及，据奏尔年渐长成，深明经典，可兴黄教。闻奏不胜欣喜。朕俯临亿兆，中外视为一体，尔能奉持法律，普渡群生，宜加优奖。尔前

世荷蒙圣祖仁皇帝厚恩赏给金印敕封，今尔勤习经典，亦宜赐以金印敕封，俾大兴黄教，祝国裕民，以绵我大清亿万年无疆之景运。其都伯特事宜，仍照前世率领属下妥协办理。尔宜仰体朕心，始终勿怠。所有金册、银缎等物，俱付都统乌尔图纳逊等前往赏赉”。（见《清实录》乾隆朝）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金册金印送到西藏后，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初一，在布达拉宫中举行了隆重仪式，颁诏用七十两黄金铸的金册、金印。册文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达赖喇嘛之瑚碧勒汗，昨班禅额尔德尼经来自后藏，庆祝朕七旬万寿，朕询及尔年岁学业。据奏尔年已及岁，经文该博，夙慧圆成，志心利益众生，继承法教，深惬意怀。……尔前身蒙圣祖恩眷，特封园满教乘导利群生达赖喇嘛，今以尔慧性光明，该洽经典，爰自龆龀，承袭法教，志心利益，坚持戒律，使群部皈依，朕甚喜之。兹特依前七辈达赖喇嘛之例，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咱喇达赖喇嘛”。（见《朱批奏摺》）此册文中明确了格桑加措是七世达赖喇嘛。乾隆四十八年（1782年）又颁玉册、玉宝加封姜白加措，册文曰：“国家海宇清晏，民物攸宁，抚育中外，振兴黄教。自宗喀巴崇阐宗风，宣扬梵律，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法嗣，根敦噜巴八转世身也。夙惠圆成，性身常住，十方供养，华夏皈依。先是顺治年间，五转世达赖喇嘛来京瞻覲，恩礼崇隆。自兹四世咸倾心依向，广布教乘，宠渥有加焉。尔达赖喇嘛教演禅宗，诚殷唪祝，普天福寿，永世吉祥，诚国家道治重熙，休和之盛事也。以尔性体纯全，法源广布，朕甚嘉焉。兹特加殊礼，锡之玉册玉宝，尔其祗领，供奉于普陀宗乘之庙，永镇法门，逢国庆典用之章奏。”（见《清实录》乾隆朝）此册文中不仅明确了姜白加措是八转世达赖喇嘛，而且文中还明确了从五世达赖喇嘛至姜白加措是“四世咸倾心依向，广布教乘，宠渥有加焉”。这“四世”当然就是指五世达赖罗桑加措、六世达赖仓央加措、七世达赖格桑加措、八世达赖姜白加措了。总之，除乾隆

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在他所撰写的《喇嘛教说》的一行小注中仍把格桑加措说成是六世达赖喇嘛，姜白加措说成是七世达赖喇嘛外，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起到后来的有关正式谕旨中都确认了姜白加措是八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是七世达赖喇嘛，从而仓央加措也就随着被清朝确认为六世达赖喇嘛了。

在上述的历次敕谕中都可以看到乾隆每次都说，他是爱先皇圣祖仁皇帝（康熙）册封前辈达赖喇嘛之例册封姜白加措的，但是他却没有按照康熙顺从蒙古和硕特众台吉意愿册封格桑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这一序列册封姜白加措的，而是按照多少年来藏族人士的意愿即仓央加措是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是七世达赖喇嘛，姜白加措是八世达赖喇嘛这一序列册封的，从而彻底理顺了这一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得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有下面这四点：（一）乾隆时期是有清以来，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的势力彻底在青海和西藏结束，清朝已不再受其干扰而能按西藏的实际情况和藏族人士的意愿直接进行处理西藏事宜的时期；（二）与乾隆本人对西藏的社会、历史、政治、宗教、文化有透彻的研究，对藏人士的心理有深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是历史学家公认的、曾有效治理藏事的一位历史人物；（三）从藏族人士方面来看，这个时期有像六世班禅大师、章嘉国师、代理达赖喇嘛策门林一世等这样一些既有很深的宗教教旨，又竭诚拥护清朝，多年来积极协助清朝治理蒙藏，深受乾隆信任和尊重的人物。他们是有清以来少有的几位能直接同皇帝见面讲得上话的藏族历史人物。由于第二点原因和第三点原因的结合，所以，不仅是解决册封达赖喇嘛的序列差这个问题，就整个乾隆时期而言，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相互通气，相互配合的都很好，曾解决了西藏一系的重大问题。如此前在处理朱尔默特事件时，乾隆削弱了世俗贵族的权势而把西藏的政教大权交给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直接掌管。设立噶厦政府，开创了僧俗共同担任噶伦的新制度。格桑加措圆寂后设立了代理达赖喇嘛这一职位。后

来平息廓尔喀事件之后，钦定二十九条，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由摇金钵巴瓶掣签决定等重大制度的设立都是在他这个时期，由乾隆谕旨下令，由西藏首领人物积极配合完成的，（四）历史的机遇，即这个时候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圆寂后，要册封新转世的姜白加措了，这样就把解决这个达赖喇嘛序列差的问题重新提上了日程，为它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

乾隆这次一反祖宗圣谕而顺应西藏民心，确认了仓央加措是六世达赖喇嘛，理顺了多年来不协调的达赖喇嘛序列差这个问题是有其积极历史意义的，曾赢得了六世班禅大师，八世达赖喇嘛姜白加措、章嘉国师、策门林一世等等广大藏族人士对他的更加崇拜，对清王朝的更加拥护，从而更加巩固和发展了十八世纪中国民族大家庭的熙和和国家之统一。所以，应该予以积极的肯定。

六世班禅大师东来旅途记要

多 杰

第六世班禅大师罗藏·华勒丹伊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东来热河朝覲，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之举，为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上颇值称许之一件大事，六世班禅大师为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方面曾做出重大贡献。班禅大师此行万余里，历时一年零一月余，而彼时，道路险阻，行旅驮运、全赖畜力，跋山涉水，万里迢迢，东来热河，诚非易事。途中所经之处，前来顶礼膜拜，祈求加被者络绎不绝，少者数百，多者数千，甚至有时聚集等候之各部落、蒙旗、千百户、王公、扎萨克等及各族人众竟达数万之多，以至被迫停留，为之摩顶加持。后为不至耽延旅程只得于行进之中用彩绸扫触而过，予以加持。此外每至一地均须履行迎送仪礼，亲赴各种法会，传经授戒，作灌顶加持，旅途颇为辛劳。所幸班禅大师尚值壮年(时四十二岁)体力精神想必充沛，否则殊难承担如此辛劳之重任。班禅大师虽以黄教教主、至尊喇嘛之身份与各族各阶层人士接触，广结善缘，但此行为朝覲乾隆皇帝、祝贺万寿则为人所共知，故对当时加强各民族间之交往，融洽各族人民间之关系，以及对祖国之统一，必定起到广泛与深远之影响。

嘉祥协巴·贡却久美旺翰所著《第六世班禅大师传》(后藏，藏文木板)对班禅大师东来经过叙述甚详，如对东来热河之缘由，以及旅途中一再受到乾隆皇帝优渥恩崇，多次賚送谕旨致候、赏赐皇帝御用衣帽、饰物、器皿等大量礼品，賜乘御用黄轿、仪仗，及在热河为班禅大师专建佛堂、驻锡行宫，以及大师